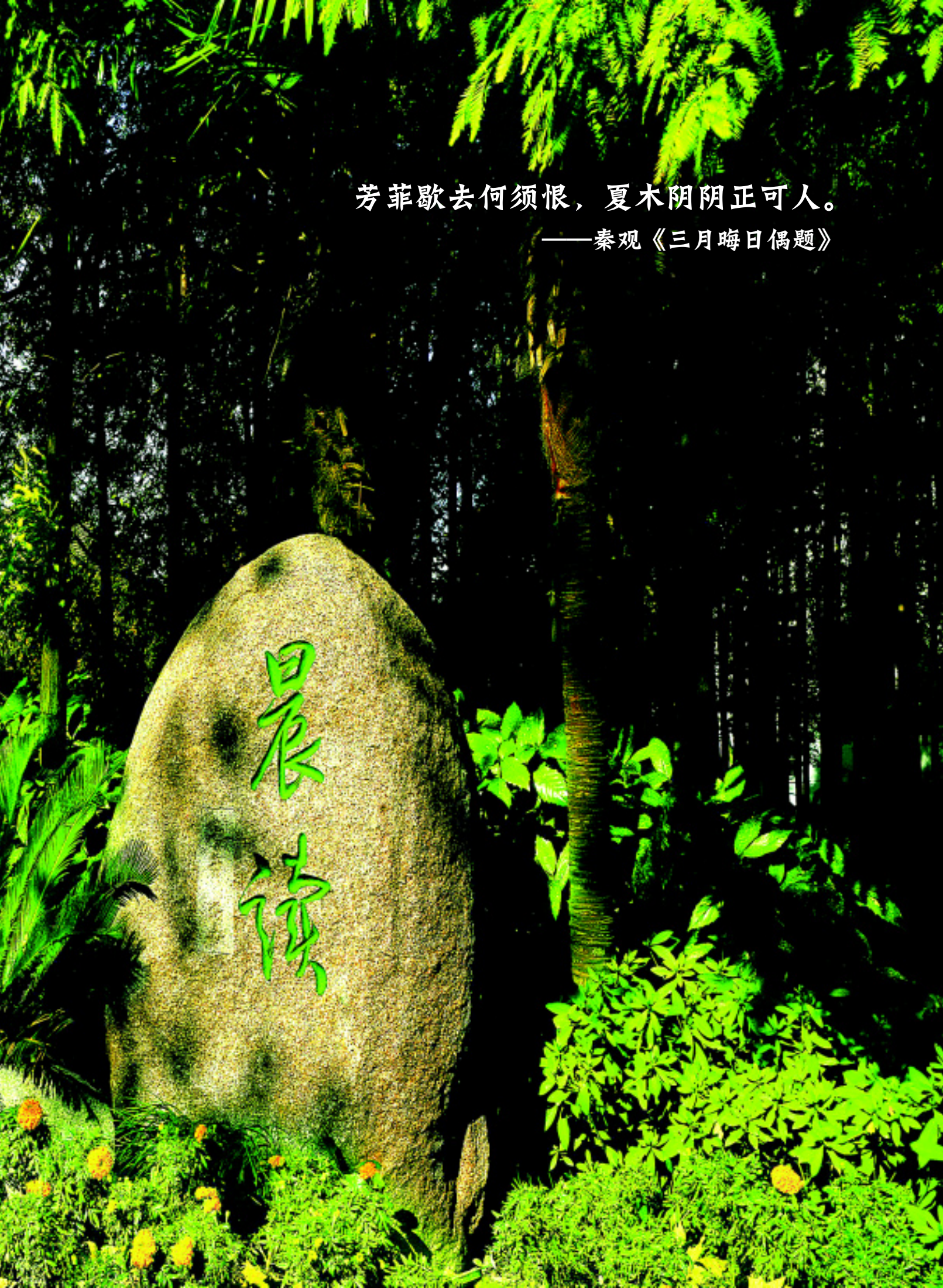




芳菲歇去何须恨，夏木阴阴正可人。

——秦观《三月晦日偶题》





06
要闻

复旦管理前沿论坛聚焦长三角融合

2007年5月27日，复旦大学管理前沿论坛之“长三角——重返经济舞台中心”在上海裕景大饭店隆重举行。本次论坛由复旦大学管理学院、香港大学经济及工商管理学院、《全球商业经典》杂志共同主办。会议邀请了众多来自学术界和企业界的嘉宾，畅谈未来长三角地区经济发展走势。

吴春华 点亮梦想出发

30
面对面

复旦管理学院22岁的应届毕业生吴春华有幸成为美国华盛顿大学奥林商学院三个营销学博士生之一。





76
校友汇

慈善健康跑 跑出健康跑出爱

2007年5月26日，复旦大学管理学院首届校友慈善健康跑在复旦江湾新校区举行。本次活动的主题为“跑出健康，跑出爱”，吸引了200多位管理学院校友参加。

CONTENTS

WWW.FDMS.FUDAN.EDU.CN
试刊第二期



封面图片　刘　畅

管院要闻

八位学者专家会诊长三角 08
触摸长三角喷薄的心跳 11
产业经济学科蝉联全国重点学科 12
复旦管院学术研究再创佳绩 13

我的管院记忆

抗战时期的复旦大学商学院 16
复旦管院23位毕业生寄语 22

大视野

不投资股票难成经济学家 32
中国，大国崛起的风险 34
新富心态下的中国奢侈品消费 36
金融市场：企业发展助推剂 40

管理大讲堂

连锁经营中的人力资源管理 46
从供应链管理中要利润 50



18 我的管院记忆

复旦管院创建之初的时光

郑绍濂教授，复旦大学管理学院第一任院长，今天的管院人喜欢亲切地称他为“老郑院长”。在30年的岁月里，从敏锐意识到时代的需求到筚路蓝缕的辛勤开拓，老郑院长走出了一条不平凡的摸索之路。伴随着他的汗水与足迹，复旦管理学院一天天地成长壮大。

必死三要素和企业内控

42 大讲堂



说到内部控制，美国八十年前就有了，英国一百年前就有了。事实上，内部控制不是美国发明的，而是中国人。这个人非常厉害，16岁，而且是个女同志，她是谁呢？



73 人在管院

宁夏感动之旅

经过一个月的策划，带着复旦—挪威MBA项目老师和同学们对宁夏贫困地区孩子们和支教队的慰问，我们终于踏上这片西部的土地。

管理实践区

诺基亚以人为本的传奇 53
飞利浦：在21世纪创造价值 56

专栏

逆风飞扬和社会宽容度 59
MBA学习精髓在哪？ 60

商学界

MBA国际化与本土化之辨析 61
年营收8亿的“小商学院” 63

天下

以国家名义捍卫文明底线 68
温家宝：大学生应常仰望天空 69
香港十年 70

知识分子问卷

I KNOW 72

校友汇

孩子们成慈善健康跑明星 78
“这是健康快乐的生活方式” 80
黄耀诚：复旦精神影响着我 81

人文复旦

《易经》里的创业经营之道 83
北京模式挑战华盛顿模式 86

记事本

丰富多彩复旦大学管理学院 88

管院书局

《转型期的中国企业营销》 93
《现代组织行为学》 93

生活方式

静静的蓝毗尼 94

管院记忆

7月，又是毕业的日子，空气中弥漫着些许感伤的味道。

离别的时刻，打开记忆的阀门，耳边响起那首《凤凰花开的路口》。

相信这一期中那些浸透历史沧桑的管院记忆会给即将离开这里的你们一个难忘而历久弥新的回忆。

复旦大学管理学院第一任院长郑绍濂教授，85岁的老校友吴强老师……他们娓娓讲述着属于那个时代的管院。

也许，我们并不知道：

战乱年代寄身重庆的复旦大学，商学院曾是她的安慰和骄傲。40年代的复旦商学院在教学上已实行了学分制，专业课已采用英文版教材，商学院的校友已遍及当时金融业和政界。

也许，我们并不了解：

复旦大学管理学院最初创建的时候，也曾“居无定所”，先后辗转搬迁七次：从机修厂的仓库，到光学楼借来的房间；从寄居在计算中心，到辛苦建起并入住的南楼。而今，终于拥有了自己的一方天地。

在离别时，岁月的音符被无数次的低吟浅唱。对于我们即将毕业的学员，也许就是管理学院的一名老师、一堂课、一本书，引领了你管理知识的提升，也许就是一位同学、一件小事让你为之感动。

梧桐树下，讲台之上，我们收集了太多属于管院的记忆，记忆中有笑容、有坚韧，也时而泪光闪动……

透过这些记忆，管院因此而精彩。

复旦大学管理学院
管理教育推广和发展中心


博学而笃志
切问而近思



王于渐 教授
香港大学首席副校长



陆雄文 教授
复旦大学管理学院院长



陶志刚 教授
香港大学管理学院副院长



左学金 教授
上海社科院常务副院长

复旦管理前沿论坛聚焦长

文／刘海阳 王茹辛　　图／陈冬涛

2007年5月27日，复旦大学管理前沿论坛之“长三角——重返经济舞台中心”在上海裕景大饭店隆重举行。本次论坛由复旦大学管理学院、香港大学经济及工商管理学院、《全球商业经典》杂志共同主办。会议邀请了众多来自学术界和企业界的嘉宾，畅谈未来长三角地区经济发展走势。

出席本次论坛的嘉宾有香港大学首席副校长王于渐教授，经济及工商管理学院副院长陶志刚教授，复旦大学管理学院院长陆雄文教授，副院长孙一民博士，上海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经济研究所所长左学金教授，上海市政府特聘决策专家、上海社科院部门经济所所长杨建文博士，瑞士银行董事总经理兼投资银行中国区主席蔡洪平先生，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总经理卢伯卿先生和瑞安房地产公司总经理邓嘉华先生。

在本次会议中，复旦大学管理学院和香港大学经济及工商管理学院一份针对长三角经济发展的的学术研究调查报告《重返经济舞台中心——长三角经济区融合转型研究》同时出炉。该报告对长三角的角色定位进行了积极的思考，同时也点出长三角制造业转型与融合面临的机会与挑战。

这份报告由复旦大学管理学院和香港大学经济及工商管理学院多位教授共同参与主持和研究。报告研究历时三年有余，检索了国内外几乎所有有关长三角经济发展的有价值的文献，其中包括上世纪90年代后公开发表的558篇论



杨建文 博士
上海市政府特聘决策专家



蔡洪平 先生
瑞士银行总经理



卢伯卿 先生
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总经理



邓嘉华 先生
瑞安房地产有限公司总经理

三角融合

文和研究报告，描绘出了长三角近二十年区域经济发展的轮廓和脉络。

调查对象涵盖了长三角地区16座经济发达城市，针对区内29种行业的中高层企业管理者进行面访，获得2405个有效样本。实地调查历时10个月，由专家严格控制抽样访查过程和问卷质量，从而保证了数据的可靠性和真实性。

本次论坛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近300人报名参加了本次论坛。与会嘉宾的精彩演说也引发了现场观众对于长三角地区未来经济转型的思考与讨论。

在简短的致辞之后，复旦大学管理学院院长陆雄文代表上海、香港两地学者，向与会嘉宾介绍了三年来对长三角地区经济发展状况的研究成果。他在发言中对研究长三角的原因、途径及主要研究成果进行了简明扼要的概括。一系列具有说服力的数据和调查勾勒出长三角产业发展的历史与现状，并对长三角的进一步融合提出了有针对性的意见建议。

与会嘉宾还就上海在长三角的定位问题进行了讨论。嘉宾们认为，上海今天又站在一个历史的关键时刻，发展仍然极大地需要政府的智慧和勇气。只有为了整体的、长期的利益而舍弃一部分短期的、既得的利益，加快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区域的服务整合，那么上海成为长三角的上海，中国的上海，乃至全世界的上海都是指日可待。

八位学者专家会诊长三角

文／刘海阳 王茹辛　　图／陈冬涛

长三角与珠三角的比较

王于渐：今天珠江三角洲的繁荣，其实有很多香港厂家的贡献。为什么香港厂家要去珠江三角洲呢？理由很简单，因为中国开放了。当时香港殖民地政府没有允许他们去，但是他们都去了。我觉得关键是政府不要阻止这件事情，它就会发生了。这对今天长三角的融合是有借鉴意义的。

今天高速发展的长三角，在经济融合的过程中，不同的地方会有不同的分工，假如说行政上阻止这些分工的形成，那么融合的进程一定就会变缓。经济融合其实就是怎么听市场的话，政府有时扮演着很重要的角色，有些是政府要去做的，有些是政府不能去做的，这点一定要分清楚。

陶志刚：长三角和珠三角这两个地方有两大分别。第一，上海是一个零售和批发中心，假如你是一个外资企业，关心国内市场的话，上海、长三角你必须要重视；而珠三角则作为一个进出口的中心，它是通过香港服务全世界的地方，它是世界的生产基地。珠三角是外向型的经济，长三角基本是以国内市场为主。第二，长三角的工业技术更加多元化，而珠三角相对而言专业化分工比较强。

蔡洪平：从某种意义上来看珠三角的竞争力非常强。比如说政府，广东的政府是非常开明的，他们的政策是非常活的。但是我们发现广东很少有人做制造业，香港大部分的厂商都是做动产，很少做房地产，在广东则有很多做房地产的。从上海来说，我认为除了制造业以外，其他方面如展览业也大有可为，物流业、军工，还有宇航航天、大型机电设备等都是如此。我认为这两个地区都很好，长三角和珠三角是中国经济腾飞的两个翅膀。

长三角发展优势和不足

蔡洪平：现在长三角有三个产业非常的丰富，一个是传统的制造业，一个是造船业，还有生物、医疗器械。我认为长三角的人文条件非常高。包括政府也是一样，他们的规划做得非常好。

不可喜的地方就是金融这块，我并没有看到上海金融业的崛起。上海应该成为长三角的龙头，龙头不是叫出来的，只做几家交易所是不能称为金融中心的。现在上海成为金融中心已经呼之欲出，虽然这很困难。

左学金：我想长三角可以扩大在全国地区的辐射作用，可以带来无限的商机。比如说上海建设交通轨道系统，这里就有大量的投资机遇，当轨道交通修建以后，对城市的布局将会带来很大的影响，这里有很大的机会。提高经济活力，最终还是要提高我们每一个中国人参与经济增长的机会和活力。中国人都是很有活力的，如果每个人都有参与经济增长的机会，中国将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当然这个环境还需要我们进一步地营造，长三角



的合作，我想会进一步的发展，不仅为现在进入长三角的人，而且会为将来进入长三角的人提供更多的机会。

杨建文：我认为长三角企业发展面临着四个问题，第一，地区间的人才流动有很大的问题。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呢？我们的政府正在考虑户籍制度有没有存在的必要，能不能首先在长三角地区取消户籍制度。第二个问题是融资的渠道不够畅通，成本过高。尤其是民营企业家压力很大，民营企业家受到一些歧视，他们的融资能力就更差了。第三个问题是在经营过程中市场诚信的问题。最后还有基础设施的问题。

发展中的政府角色定位

卢伯卿：我认为政府要构建的是一个平台，而不是去辅导。应该尽量地减少行政性的干预，让市场机制充分发挥出来。只要有利润的地方，有开发的前景，企业总是会勇往直前。所以不需要太多的行政干预去制约和拉动。

陆雄文：其实政府在国民经济中扮演着很重要的角色，我们现在对于国外开放的透明度越来越高了，但是国内无形的保护、障碍还是很多，这些政府都应该主动改革。

我觉得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政府应该是强势的，在对一些大的、关系到国计民生的方面，政府也应该有勇气和智慧来做这些事情；对于那些并不牵涉国计民生的方面，则应该放手让市场自由地去做。大的环境已经为政府的改革创造了条件，我们今天面临一种考验，就是要看政府愿意不愿意为一些短期的利益做出一些牺牲。现在问题是政府理念没有办法改，很多人不愿意放弃，所以在经济体制上就没有办法。

左学金：产业分工需要在市场竞争当中逐步形成，这里面最关键的因素就是不能有过多行政上的干预。比如说土地的价格，如果土地的价格可以反映土地的稀缺程度的话，上海作为一个1800万人口的大都市，它的地价自然就会高了，随着地价升高，房价也会变高，人工会贵，我觉得这应该是比较自然形成的，但是如果我们政府行政干预的话，比如说我们把地价压的很低，那么就会有很低的产业进来，这个结果是扭曲了市场的信号，是不合理的。

长三角内的合作和竞争

左学金：我认为长三角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政府会在两个方面做工作，一个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使我们的企业能在更加完善市场经济体制中运作，不受行政边界的阻碍，各种要素比较自由地流动。另一方面，长三角要加强协调，在协调机制方面还要做很多的工作，很多的基础设施确



温家宝座谈长三角发展

文／新华社

5月15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上海主持召开长江三角洲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座谈会。温家宝指出，要进一步解放思想，推进改革开放，充分发挥区域优势，促进长江三角洲地区实现率先发展、科学发展，增强综合实力、创新能力、可持续发展能力和国际竞争力。

温家宝指出，长江三角洲地区区域优势明显，在我国现代化建设中处于举足轻重地位。推进长江三角洲地区实现率先发展具有全局性意义。长江三角洲地区率先走科学发展之路，不仅是自身发展的迫切需要，也可以为全国其它地区提供有益经验和借鉴，具有重要示范作用。

温家宝指出，在新的更高起点上谋划长江三角洲地区的更好更大发展，视野要宽，思路要新，起点要高，看得更远，想得更深。要发挥各地比较优势和区域整体优势，确定正确的发展方向、发展战略、发展模式。

据悉，该次座谈会上讨论了一份《进一步推动长三角改革开放和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指导意见》，并预计在今年8月份下发长江浙沪省市。

十一部委调研长三角

文／陈小莹

2007年5月21日，国家发改委、商务部、财政部等十一部委20多名官员飞往杭州，对长三角省份展开密集调研。此前一两周里，国家发改委主任马凯已经领了几拨人马，先期抵达长三角一些重点城市考察。

记者获悉，由国家发改委体制经济改革司牵头，十一部门正就长三角区域规划进行专题调研，目的在于如何破除影响长三角区域统筹协调发展的体制障碍。十一部门专题调研，就是要听取江、浙、沪各方对突破经济、社会发展存在的体制障碍的意见。

具体调研内容为，资本和人才等要素市场如何流通、长三角地区如何一体化，以及城乡如何一体化等问题。

“在长三角一体化的合作中，经济和社会要素的合作已经上升到了制度层面的合作。”国家发改委长三角区域规划综合组研究员郁鸿胜解释说。郁认为，今后的合作主体将是长三角的各个政府，合作领域将围绕“基础设施一体化”、“市民化一体化”、“生态保护一体化”等一些必须由政府协调的、公共性领域。

（原载于《21世纪经济报道》）

实有着行政边界。我觉得应该跨越行政边界做规划，做建设。现在大家做规划的时候，就不应该各家自己做，而应该成为一个规划的机构。

蔡洪平：我认为长三角的融合，政府方面需要做大量工作。抛弃狭隘的眼光，三方坐下来好好谈一下，很多事情可以放开来谈。我是一个上海人，但是我要批评上海人。上海人固守的观念太多了，所有的中国人都在改变自己的生活，上海人也没有什么可骄傲的。必须打开眼光，呈现给世界一个完全不一样的面貌。

陶志刚：今天我们很难说25年以后中国会不会超过美国、世界银行的总部会不会在上海，但是我们至少应该有这样的目标。刚刚我们讲对外开放，对内保护，实际上对外我们是开放，对内却有很多的壁垒。我们看中国几乎所有的产业都有这样的特点：竞争最后是无序竞争。如果健全市场机制的话，最后可能就是效率最高的活下来。这个过程中会有一些损耗，我们要关注的是能不能把损耗降到最低。其实，我们要么是合作，要么就是竞争。现在国有企业的兼并是很难的，所以我说合作很难，那么就只能靠竞争了，竞争到最后就会产业化。

长三角人才培养与流动

左学金：长三角在全国的经济发展中应该是处于领先的地位，我们到底领先什么？我想中国的经济在未来的二、三十年将会发生重大的转折，这个转折就是我们国家劳动密集型的制造业优势会逐步地消失。到那个时候，长三角应该在增长观念的转变、在知识、在生产创新上领先，这方面我们有很多的工作要做。比如说我们要更加重视研发、营销管理，更加注意价值链的两端，我们要加强对人力资本的投入，提高人力资本的服务，比如说教育和医疗。我们要把我们的人力资本看成是最重要的资产，这个资产要比任何其他的资产更加重要。我们要进一步的注意人才流动的问题，现在人才流动还是很困难的，我想这些是我们上海的企业和长三角的企业所面临的共同的任务。

邓嘉华：我相信作为一个外地的公司，有一些大的机构具有自己的文化背景，他还是会坚持他的思路发展，比如说在有一些城市，能够配合公司的文化去发展的话，就可以很快的发展起来。看一个城市发展，它的配套设施是很重要的。比如说上海，全国拥有50个国际学校，其中有23个在上海，这说明上海在教育、引进外来人才的配套方面还是很不错的，我想这些也能帮助到上海的发展。

卢伯卿：我认为从人文层面来讲，21世纪是人才的竞争，我们看到长三角有很多著名的大学。如果上海成为一个国际经济中心，有很多的企业的亚洲营运中心都会放到上海来。人才不是靠标签的，而是面向社会去招的。现在有这样的行政性干预，规定如果不和这个实习学生签三年的合同，他就要怎么怎么样。政府这种限制可能是出于好心，但是这种结果往往不能得到预期的效果。

陆雄文：我们现在缺的是非常好的技术人才，还有就是国际层面上的国际研发人才，以及跨国公司的高层管理人才，最顶端的人才很少。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我们限制人才的流动的话，这个城市的人才市场也不会发展起来。我觉得打破人才壁垒是非常重要的，目前这可能还受着传统体制的限制，我们贸易的壁垒还是存在的。有没有可能在两省一市之间形成一个协定，有一个立法能够消灭两省一市非关税等无形的贸易壁垒，这都关系到未来的发展。

触摸长三角喷薄的心跳

文／王于渐 陆雄文 陶志刚 孙一民 邵启发 蒋青云

当中国由封闭落后的经济在短短二十年间迅速成长为全球经济十强，并逐年攀升至今天全球第四大经济的时候，我们没有理由不相信中国在改变着世界经济的版图，并成为引领全球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而区域经济是中国经济迅速成长的重要动力，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又是其中最具活力的部分。

今天的长三角在各个经济总量指标上都已经超过了珠三角，同珠三角经济并行发展，成为中国经济增长最重要的引擎。在中国经济面向未来二十年发展的战略考虑过程中，所有的学者、企业家和政府官员都会关心这样的问题：中国各区域经济间的相互关系如何演进？谁能提供更强劲的动力？谁更有可持续发展性？谁能为别的区域经济发展提供借鉴和指示的作用？我们怀着学者的使命和热忱，试图通过我们的研究提供我们的答案。

我们历时三年有余，检索了国内外几乎有关长三角经济发展的所有有价值的文献，其中包括上世纪九十年代后公开发表的558篇论文和研究报告，描绘出了长三角近二十年区域经济发展的轮廓和脉络。我们认为构成长三角经济的主要基础和强劲增长的动力来自于制造业的发展，因此我们在对代表性企业进行访谈和焦点小组讨论的基础上，对长三角地区的制造业进行了大规模抽样调查，共回收有效问卷2405份。我们相信这是迄今为止对长三角区域经济最大规模、最全面的实证研究，揭示了长三角地区制造业企业的发展渊源、实际状况、增长动力和所面临的困惑以及对未来的期待。基于我们的问卷调查，结合我们的文献回顾和理论研究，我们得出了有关长三角区域经济发展的三个基本结论。

第一，长三角区域经济近十多年来突破性发展的基本和主要的动力来自于市场的力量，对于江苏而言就是大规模引进外资后所形成的面向国际市场的外向型经济，对于浙江而言就是“国退民进”政策实施后所涌现的活跃的民营经济，而上海的开放给了跨国公司在全球范围内重新布局的机会，经济资源和生产要素的流动突破了行政区划的阻隔，使经济活动的内在关系得到联接，促进了区域经济的融合和活力的喷发。

第二，政府为长三角经济的活力重现和蓬勃发展积极创造了适宜的宏观环境。然而，政府并没有成为长三角经济区域融合的基本动力，原因在于他们在主观上并不愿意快速放弃对经济控制和资源分配的权利，在客观上也难以逃脱经济总量增长的符咒，在各省市政府为了促进长三角经济整合的若干设计和捏合的实验中，我们都看到了其失败的必然。

第三，长三角区域经济的一体化还远未完成，而且还只是刚刚起步而已。一体化的进程起始需要政府放松对经济管制，促进市场的自由化，以释放经济的内在潜能，而它的实质性演进必须依赖于企业和企业家追逐利润的意愿和作为，以此形成资本和生产要素在更大的地理范围和市场空间进行配置和重新配置，以形成区域经济的活力，逐步形成资源的优化配置和经济结构的互补与改善，从而促进整体区域经济的融合与发展。

基于上述研究发现和结论，我们不得不站在历史高度来审视长三角区域经济的发展、转型以及未来的走向。我们认为制造业是长三角区域经济的历史基础，也是其成长为中国经济中心的战略路径，但它反映的是历史和现实的状况，不能代表其未来的前途。任何发达的区域经济要承担起引领整个国家乃至地区经济的发展，就必须有发达的服务业、尤其是生产服务业的支持。长三角的服务业只占整个经济的40%多一点，这显示了整个经济结构的落后，但也喻示了整个服务业发展的潜力。上海都必须承负起超越自身发展、引领区域经济并推动整个国民经济持续发展的使命。上海发展服务业，尤其是生产服务业，不仅是其产业结构升级以快速进入发达经济的战略目标，也是实现这一目标唯一的战略路径。因此，上海必须放弃一些以追求短期GDP增长为考量的制造业布局，以担当区域经济龙头的历史勇气和智慧来大力投入于服务业，尤其是生产服务业的发展。当整个长三角经济结构变得更加相互支持和融合，整个区域经济的一体化才能真正实现，其所蕴含的经济成长潜力才能得到彻底释放，而这又会进一步提升区域内各产业朝着知识型、密集型方向发展，如此，背依中国大陆和全球各地两大市场，就能使之发挥出巨大的溢出效应，引领中国经济进一步快速稳定地发展。

今天我们站在一个特定的历史时点，看到长三角又重新回到了经济舞台的中心，对于其未来的转型和成长，我们同样抱着深切的期待。

（本文为《重返经济舞台中心——长三角经济区融合转型研究》一书序，标题为编者所加，内文有删减。）

产业经济学蝉联全国重点学科

今年复旦大学管理学院产业经济学科再次被评为国家重点学科，这是该学科继1988年、2001年两度被评为国家重点学科之后，再次获此殊荣。

文／吴兴宇

近日，历时近半年的国家重点学科考评工作终于落下帷幕，复旦大学管理学院产业经济学科再次被评为国家重点学科。这是该学科继1988年、2001年两度被评为国家重点学科之后，再次获此殊荣。

国家重点学科是由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对学科进行的综合考评，具体考察学科的学术水平、科研成果、师资力量、国内外的声誉和地位等多个方面。本次考评工作于去年年底正式启动，2007年1月20日前报送完毕，考评的范围是各学科在2001年—2005年取得的各项成果。经过相关学校重点学科的互评，成绩优秀者方能保持重点学科资格，排名较后的则需参加下一轮增补重点学科的申报。

复旦大学产业经济学科发展至今已有20多年的历史，目前已经形成五个具有特色的产业经济研究方向：产业链与知识网络、产业组织与经济规模、东方管理与产业发展、产业创新与产业结构演化、产业生态系统与产业竞争力。以产业组织与经济规制基本理论的研究为基础，这五个方向构建了一个系统的学科研究框架，形成了复旦产业经济学科研究特色，促进了学科融合和理论创新，以实现立足中国实践、接轨国际的目标。

再次获评国家重点学科，不但充分肯定了复旦大学管理学院产业经济学科过去五年所取得的各项成绩，对于复旦大学建设国际一流大学、管理学院建设国际一流商学院也具有重要意义。产业经济学科在未来的良好发展，还将带动相关学科的发展。

据悉，在本次国家重点学科考评中，复旦大学共有45个重点学科通过考核，全部再次获得国家重点学科资格。

5年来，在复旦大学管理学院芮明杰教授的带领下，复旦大学产业经济学科建设完成和部分超额完成了2001年的建设目标，取得了比较突出的成绩，具体体现在五个方面：

1、把握学科发展的国际前沿发展趋势，高起点高投入加大学科研究的主流领域的研究力量，获得了一系列重要成果：2001—2005年期间本学科完成国家自然科学基金9项，国家社会科学基金3项，省部级课题16项；在国际SSCI、国内顶级学术刊物发表论文27篇，在其他权威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34篇、在CSSCI上发表论文303篇；出版专著19部，教材17部，翻译国外产业经济学经典著作1部。

2、多学科融合与交叉，进一步拓展产业经济学科新领域，研究解决国民经济发展中的产业经济新问题，形成新理论新方法，形成复旦大学产业经济学的学科特色。

3、以培养学术带头人及学术骨干为重点，引进海内外优秀人才，形成了若干有开拓能力的研究团队。通过五年的人才引进和人员结构调整整合，目前我们已经形成了以芮明杰教授、苏东水教授、郁义鸿教授、殷醒民教授、胡建绩教授等为首的37位教师的队伍，形成了五个创新研究团队。学术团队中，包括三位跨世纪人才、一位新世纪人才和一位国家学科评议组成员。团队人员结构合理有后劲，创新能力强，为一流科学成果的生产和学科的持续发展奠定了人力资源基础。

4、培养学生的国际视野与理论联系实际的科研能力。2001—2005年期间，本学科博士研究生共发表论文425篇，其中CSSCI214篇，硕士研究生发表论文231篇，其中CSSCI82篇。有2篇博士生国际合作论文发表于SCI来源期刊，出版著作4部。

5、建立学科知识共享学术平台，提高自主科学创新能力。5年间举办了7届国际会议，开展了5项国际合作项目。教师共130人次应邀出席了42次国际国内重要学术会议。通过定期举办和参加国际国内学术会议，定期举办专题学术讲座，邀请国内外著名大学产业经济研究专家讲学、交流和合作研究，选派本学科教师外出进修与研究，积极开展国内外学术交流活动，开阔学术视野，进行知识交流和共享，提升产业经济研究的国际前沿把握能力，形成我们学科发展的核心竞争力。

复旦管院学术研究再创佳绩

近日，复旦大学管理学院学术研究喜报频传，市场营销系韩中和老师、产业经济系陈杰老师申报的两个项目获2007年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立项，4项研究成果获第六届上海市决策咨询研究成果奖。

文／吴兴宇

近日，2007年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评审结果揭晓，我院市场营销系韩中和老师申报的项目《加快转变外贸增长方式对策研究——我国企业品牌国际化的实证研究》和产业经济系陈杰老师申报的项目《资产价格波动对居民消费的影响效应：宏观计量分析》成功立项。

在随后公布的第六届上海市决策咨询研究成果奖获奖名单中，我院又有4项研究成果光荣获奖，其中刘杰的《上海煤炭供需趋势预测研究》和朱道立、赵来军的《上海市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方案》获得政策建议奖二等奖，李治国、张晓蓉、徐剑刚的《上海市经济运行的不确定性因素分析》和张成洪、黄丽华的《政务信息资源登记管理规范研究》获得政策建议奖三等奖。喜讯传来，我院学术研究之树再添两枚硕果。

近日，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十一五”规划2007年系列研究课题于正式发布，其中，我院苏勇老师申报的《2010年中国上海世博会研究系列：上海世博会文化资源开发研究》课题和张成洪老师申报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提高自主创新能力研究系列：继续推进上海城市信息化研究》课题获得立项。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是我国社会科学类唯一的国家级项目，由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负责管理，项目每年申报一次，申报工作一般开始于前一年年底。本次申报的具体时间期限为2006年12月7日至2007年3月5日。自我校文科科研处去年发布申报通知以来，我院领导对此非常重视，积极鼓励各系老师踊跃申报。

根据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办公室发布的《2007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申报公告》，申报的项目要围绕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全局性、战略性、前瞻性的重大理论与实际问题来确定选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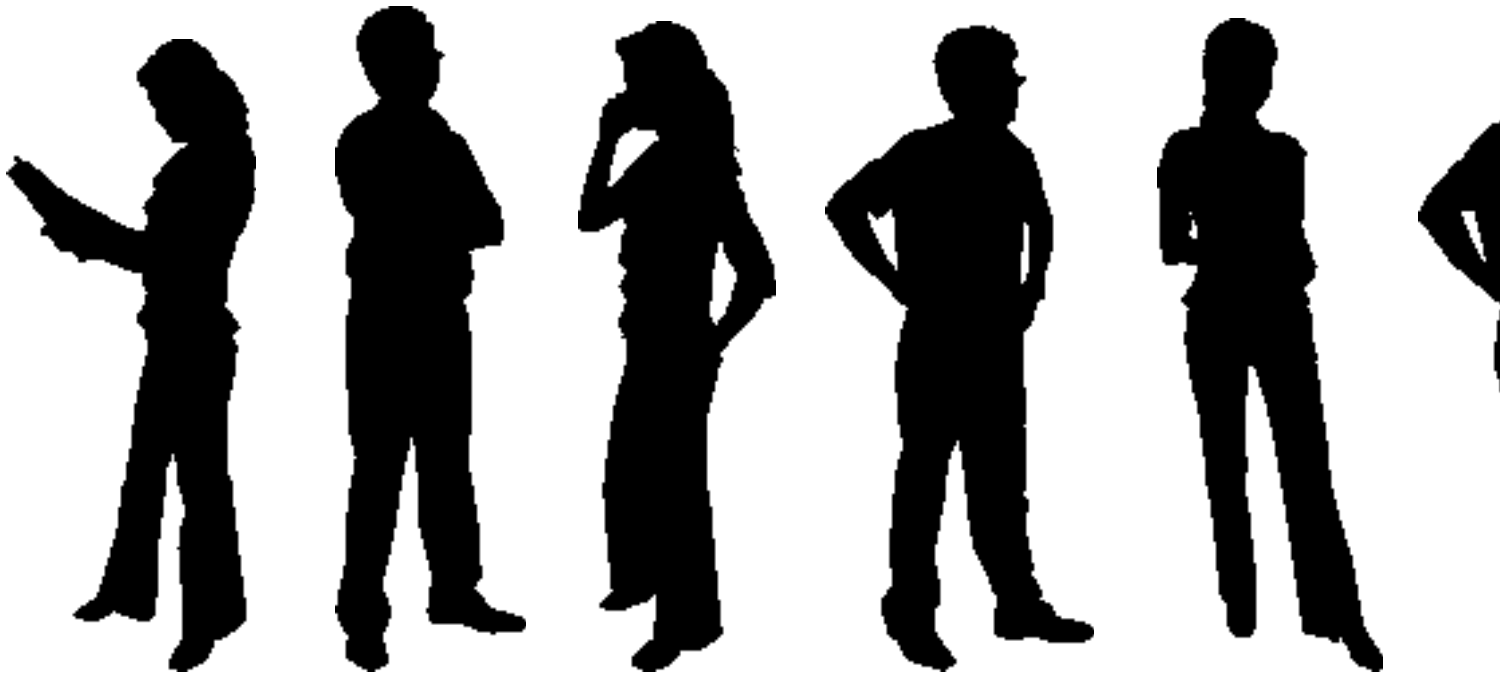
韩中和老师的《加快转变外贸增长方式对策研究——我国企业品牌国际化的实证研究》项目属于应用经济板块，计划对我国企业品牌的国际化道路进行具体的实证研究，从中探讨出我国加快转变外贸增长方式的对策。若能以研究成果指导实践，必能对整个国家社会经济的发展将带来有益的影响。陈杰老师的《资产价格波动对居民消费的影响效应：宏观计量分析》从宏观经济的视角出发，以产业经济知识作为支撑，关注民生，研究资产价格波动对于百姓消费的影响，体现了知识分子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要求。

上海市决策咨询研究成果奖由上海市政府设立，原则上每两年评奖一次，具体的评审工作在上海市决策咨询研究成果奖评审委员会领导下进行。该奖项主要用以奖励被国家或者上海市人民政府有关部门采纳应用并在实践中产生良好的社会、经济效应的研究成果，或者是经专家评议确认被采纳应用将会产生较好社会经济效益的研究成果。

本次申报工作启动于2006年12月29日，主要申报对象是2004年1月1日至2006年12月31日期间完成的研究成果。在进行申报时，申报者可根据实际情况，分别申报上海市决策咨询研究成果奖或上海市决策咨询研究政策建议奖。此次我院四项获奖的研究成果均属第二类。四项获奖成果均紧贴上海市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同侧面，并带来了良好的社会经济效益。

强调学术研究要解决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发展过程中提出的许多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强调学术研究来源于实际、学术成果应用于实际，并对社会经济的发展做出应有的贡献，是管理学院优秀传统和一贯原则。初夏季节，三喜临门，在2007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申报和第六届上海市决策咨询研究成果评奖中喜获丰收，则是对我院一直来坚持关注社会和现实的学术研究路线的最大肯定。我院未来的学术研究必将创造更多辉煌！

据了解，在2007年度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评审中，我校共有22个项目成功立项；而在第六届上海市决策咨询研究成果评奖中，我校共有11项成果获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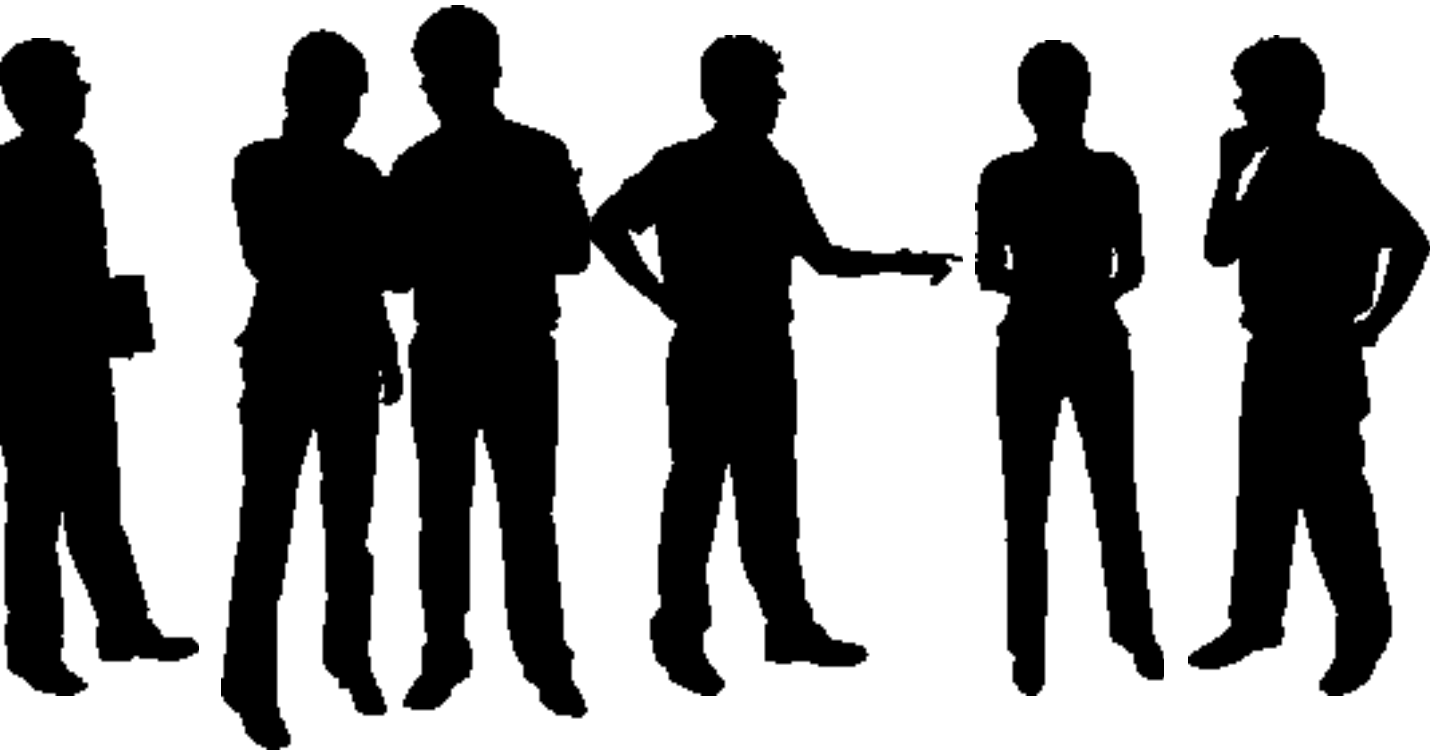


我的管院记忆

六十多年前，在遥远的重庆，他们留下了耕耘的足迹；二十多载前，在复旦大学，他们创建了管院的雏形；今天，在凤凰花开的校园，他们追述着似水的流年。

风风雨雨，在历史的笔尖流转，几代管院人储存着五彩的管院记忆。

蓦然回首，脚印之后，令他们难以忘怀的是曾经的管院韶华：抗战时的朴素清苦，八十年代的百废



俱兴，当下的奋力拼搏，对于走过这段路途的每一个人而言，这不仅仅是一次经历，更是一种生命的体验。

从解放前充斥着国内经济巨头的复旦商学院，到1985年郑绍濂老院长倾力建院，从上书教育部设立MBA项目，到现今管理学院MBA、EMBA课程的如火如荼，时光留下的是一条光荣之路，亦是荆棘之路。

这其中，无疑记录了管院人的成长历程，刻骨铭心。这段关于管院的追忆决不会在时间的磨砺下泛黄，无论是即将的告别，还是久远前的离开。

让我们来听听管院人的娓娓道来，去感悟那些过去了的、与我们息息相关的故事与情结。

抗战时期的复旦大学商学院

吴　强　男，1944年复旦大学商学院会计系毕业，194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会计系任助教。上海解放时参加接管，后任中学教师20余年。1979年起从事成人高校教育，邀聘复旦校友30余人，率先兴办企业管理及现代会计专业，同时参与发起、筹备复旦上海校友会，任一至四届常务理事，二、三届秘书长，现仍为该会顾问。是复旦世界校友联谊会3位筹备人之一，并促成李达三校友为母校捐资兴建大楼。

文／刘海阳 蔡　巧

1940年，我考入了上海商学院，也就是今天的上海财经大学。那时，上海商学院与复旦大学的补习部都在租界里，所以学习条件还算稳定。但是，好景不长，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事变爆发，日本人进入租界，作为"孤岛"的上海陷落。我们肩负着国仇家恨逃离上海，在1942年的2月初到达重庆。因为财政十分紧张，光靠私人的力量已经很难维持了。我是读会计系的，当时重庆只有重庆大学和复旦大学有会计系，我选择了去复旦，继续二年级下学期的课程。此时的复旦已经改为国立大学了。

复旦的主要声誉却是来源于商学院。首先是因为商学院比较难考，另外一个原因则是商学院的毕业生的就业前景十分好。

那时复旦的名气很响，特别是复旦商学院。商学院有会计、银行、统计三个系，每个系只有一个班，各个班上的人都不多，少的八九个人，多的也不过二三十人，所以整个商学院的学生总数也就几百个人。但是，复旦的主要声誉却是来源于商学院。首先是因为商学院比较难考，尤其是会计系十分让人头痛。专业课都是英文版教材，课外作业既难又多，学习起来费时费力。所以不少原来读会计系的人都放弃了专业而去了银行系或法学院经济系。当时的经济系是复旦第一大系，一个系就有几百位同学。另外一个原因则是商学院的毕业生的就业前景十分好，学会计的人在当时很容易找到一份好工作。当时，工商金融业的名流和政府机关的会计主管中，商学院校友很多，他们往往乐于从复旦选用人才。举个例子：复旦校友江万平，曾任抗战时期交通部的会计长，出于对母校的眷顾，他在选用各级别的会计处长、会计科长时，都是优先录用复旦会计系的校友。资源委员会主任委员孙越崎老校友配备工矿企业的财务人员时，大量录用了复旦商学院校友。

复旦商学院在那时大约有30名老师，其中一大半都是兼职，许多都是金融界、企业界的巨头。

说起当时复旦商学院的老师，有很多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复旦商学院在那时大约有30名老师，其中一大半都是兼职，许多都是金融界、企业界的巨头，通过讲课希望来复旦发掘人才。另外一些全职老师，也大多是留学归来，学识十分渊博。我们会计系的系主任张光禹就是抗战后从美国回来的，他教高年级专业课，学生人数很少，常常在他家里上课。我们都特别喜欢，因为不仅可以学到知识，还可以在他家喝到咖啡，这对于我们这些老吃不饱的穷学生而言真是一个天大的喜悦。他给我们上《会计理论》，这门课对我影响特别大，正是通过这门课程，我了解到了我们现在所说的《国际会计准则》，对我以后的工作起了很大作用。张先生还将他的藏书借给我们阅读，我还记得借过一本《Stabilized Accounting》，即《稳定会计》，就是探讨会计对物价上涨应该如何表现、运用的。

当时复旦大学各个学院都是互通的，商学院给法学院经济系等同学开设会计课程，而我们许多课也是法学课开的。法学院院长张志让，解放初担任了最高人民法院的副院长。他在当时就积极推动宪政运动，主编了宪政杂志，是赫赫有名的宪政专家。教财政学的卫挺生，老哈佛毕业生，国际知名的财政学家，当时任国民党立法委员。另外一名教我们商法的陈顾远也是国民党的立法委员，是当时的商法权威，具有很大的社会影响力。大一国文和英文课都由文学院开，教国文的有伍蠡甫、陈子展等知名教授，教英文的有林同济、孙大雨两位莎士比亚专家和大诗人梁宗岱等，那个时候，曹禺也曾在复旦教外语，他

上课时连窗外都站满了人。

那时的我们满怀豪情，希望将会计系成绩优秀的同学全部联系起来，将来在中国会计学界建立“复旦学派”。

在上世纪四十年代，复旦就已经实行了学分制。学校规定我们在一个学期要修满一定的学分，大学四年得完成136个学分。当然，也有一些课程必修却没有学分，比如体育。虽然一学期只有20个左右的学分，但其实很吃力，在课堂上老师只讲知识，我们则需要花大量的时间去复习，整理笔记，作业很重。

看看我们所学的课程也能印证这一点，当时我们的课程有《初级会计》、《高级会计》、《成本会计》、《会计理论》、《审计学》等，还有会计实习和会计论文。此外还有商法，包括《公司法》、《票据法》、《海商法》、《保险法》等四门课程。

那个时期的大学生活对我来讲最重要的就是社团活动。1942年，我们建立了一个“中复会计学会”，简称“SOA”，常常被人们误认为是“Society of Accountant”，其实真正的意思是“Specialists of Accounting”，也就是会计专家。那时的我们满怀豪情，希望将会计系成绩优秀的同学全部联系起来，将来在中国会计学界建立“复旦学派”。我们提出了两个口号，一个是“自信、互信、共信”，还有一个是从会计科目中来的，会计科目里面有关能源的叫“Heat、Light and Power”，于是我们用它作为口号，意思是“发热、发光、有力量”。这个团体让我认识了许多朋友，学到了许多东西，也锻炼了自己的能力。所以，我认为年轻人可以在大学中多参加一些社团活动。

另外，那时复旦讲座特别多。抗战时期，许多学术机构如中央研究院、国立编译馆等都迁到与复旦一江之隔的北碚，所以复旦得天独厚，得以经常延聘许多著名的专家、教授、名流，来复旦作各种报告。有这样的条件，这对我们学生来说是非常好的机会，可以拓展自己的知识面。什么生物学、心理学讲座都都去听，大大开阔了我的视野和思路。

沦陷区的学生不但不用交学费，政府每个月还发放45斤米，吃不完的米还可换作菜金，于是一个月的膳费就解决了。

那时的同学，大多从沦陷区来，生活都很贫困。我们还算幸运，在附近中学兼课，或为立信会计函授学校批改作业，得点微薄报酬，可以有点零用钱。当时复旦已经改为国立大学，沦陷区的学生不但不用交学费，政府每个月还发放45斤米，吃不完的米还可换作菜金，于是一个月的膳费就解决了。生活很清苦，八个人四菜一汤，不外乎青菜、豆腐、土豆之类。大家围着桌子站着，等桌长一发号令“开动”，八双筷子都伸向桌中央，风卷残云，一会儿菜就没有了。所以，我们还得去买竹筒装的豆瓣酱来拌饭吃，几年下来，吃辣就吃怕了。工作以后，我就再也不要吃辣了。不过，每个月学校都会有一两次打牙祭，可以吃到一大块红烧肉，那是我们最开心的时候。

同学当中给我印象最深的数我们系一个叫杨天全的同学，安徽人，家境很穷，念书特别刻苦。他穷得连一支自来水笔都没有，所以老是用蘸水笔写字。他走进教室提着墨水瓶的样子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好在他的努力没有白费，1942年他毕业时得到了兼任《政府会计》课的杨泽章赏识，杨是主计处的一位高官，介绍他进入主计处任专员。恰巧美国政府给中国提供一批公费留学名额，他就被派到了美国进修，获硕士学位后进入联合国工作，以后又在哈佛大学拿到了博士学位，曾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预算局局长、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助理。上世纪80年代，他被聘为全国政协委员，曾在全国政协会上提出中国政府应当有预算、决算。难得的是，他保存了一份十分珍贵的材料，即是从上世纪四十年代到九十年代美国的国家预算、决算。每年预算都是精装几大厚本，他藏有的历年美国预算，装了四个大书橱。后来，他将这批资料捐给了复旦大学管理学院。

重庆人喜欢喝茶，所以茶馆到处都是，光在复旦附近就有七八家茶馆。我们每每在去茶馆喝茶、看书。

1943年的下半年，复旦修建了相伯图书馆。但我们却很少去，因为我们有自己的去处。重庆人喜欢喝茶，所以茶馆到处都是，光在复旦附近就有七八家茶馆。我们每每在去茶馆喝茶、看书，费用很低。那时的茶馆有个好处，你一盅茶没有喝完可以放在原处，请老板代为保留，上完课后再来喝。当要考试的时候，我们往往就在茶馆里面复习功课，开讲座。

平时有空的时候，我们也会三五成群地去北碚各个地方玩，北碚的风景很好，可以去的地方很多。我们常常去北温泉游泳，如果不在那里吃东西的话，费用不贵。我们常是自带馒头去游泳。

安静的校园生活持续了较长的一段时间，到了1944年，校园里的政治斗争开始激化，并愈演愈烈。当时，复旦学生中有许多中共地下党、民主同盟成员，这其中包括后来曾任复旦大学副校长的邹剑秋。他们为中国的解放事业做出了很大的贡献。1948年5月我回到了上海，投身地下党领导的职业青年工作，同年8月回复旦担任会计系助教。

复旦管院创建之初的时光

郑绍濂教授，复旦大学管理学院第一任院长，今天的管院人喜欢亲切地称他为“老郑院长”。在30年的岁月里，从敏锐意识到时代的需求到筚路蓝缕的辛勤开拓，老郑院长走出了一条不平凡的摸索之路。伴随着他的汗水与足迹，复旦管理学院一天天地成长壮大。

面对无数创业的困难，承受着众人的怀疑和误解，是什么给了老郑院长坚持到底的信心和力量？那一段永难磨灭的管院记忆，见证了辉煌之初的酸甜苦辣……

文／刘海阳 王茹辛　　图／陈冬涛

说起复旦大学管理学最初的记忆，还得追溯到“文革”结束那会儿。1977年，“文革”刚刚结束，百废待兴。当时中央领导认识到，科技一定要抓上去，并准备召开一次全国科学大会，郭沫若发表了一篇很有名的文章，叫《科学的春天》。在此之前，召开了一个由各省市头头参加的筹备会，会上提出：国家要发展，科技与管理应当齐头并进，科技和管理是一部车子的两个轮子，光一个科学还不行，还得把管理搞起来。哪个省市能承担起培养管理人才任务？时任上海市副市长的陈锦华在会上表示，上海可以来做这个事情，具体交由复旦执行。

复旦大学刚接手这一任务时，连名字都没定下来，后来确定为搞“科学管理”（Science management）。现在看来，当时这个名词的概念并是不太准确，缩小了管理学科的含义。

前后七次搬家

随后，学校领导就找到我，因为我以前搞过科研管理，也学过一点经济学，具备相关的知识背景，所以学校要我主持筹建管理科学系。其实，在一张白纸的基础上，别说建立一个系，仅仅设置一个专业都相当困难。

1977年是恢复高考第一年。当我们着手准备的时候，上海的招生录取已经基本上结束了。为了解决“生源”这个燃眉之急，我只得从报考复旦理科的学生中间去挑，最后选中了12名学生。他们在中学时都曾是佼佼者，由于年龄偏大等原因未被第一批录取。为了尊重学生的志愿，也为了进一步了解情况，我还挨个儿对他们进行了家访，耐心地解释这门学科的情况和前景。不过我自己也没什么把握，心中还是颇有些忐忑的。

学生的问题解决了，接下来便是教师。当时的复旦并没有专业的老师可以胜任教学工作，我们也并不清楚到底应该开设一些什么课程，所有的一切都处在摸索之中。不得已之下，我把学生前两年的课程 “全托”给了计算机系，一方面他们也确实需要学习相关的基础课程，更重要的是我要利用这个宝贵的“时间差”做两件事：找到老师，开设专业课。我从经济学、数学、计算机系“大调兵”，费了很大劲终于“挖”来了七八位老师。一年之后，原来属于经济系的“工业经济”专业与我们的“科学管理”专业合并成管理科学系（筹），并在1979年正式建系。

系建好了，课也开了，可是老师们还没有自己的办公室。现在的管院有了李达三楼这么好的条件，当初我们却经历了一波三折，前后“搬”了七次家：从最早的机修厂的仓库，到光学楼借来的房间；从“寄居”在计算中心，到辛苦建起并“入住”南楼，最后终于



拥有了自己的一方天地。这些都不是自然而然发生的，其中有我们的争取和四处奔走，而社会需求的变化使得学校及各界对管理学科的关注和重视逐步增强，从这一点来看，我们办公"小环境"的变化折射出的是中国管理学科发展"大环境"的改变。

从日本到美国

虽然管理科学这个学科算是在复旦建立起来了，但关于"什么是管理"、"管理人才应当怎么培养"，我们都心中无数。在当时的计划经济条件下，中国的企业压根没有"management（经营）"的观念，他们的"厂长"更像是"车间主任"。因此我想到了将目光转向国外，从西方国家的企业中寻求入门之道。上世纪70年代，被称为"管理之神"的松下幸之助数次访华，我们抓住难得的交流机会，于1980年夏初访问了日本松下集团。我和另外两位老师在那里呆了差不多40天，与公司上上下下的部门和人员进行了广泛的接触和交流，去各个工厂实地察看，日方还专门派人在海外培训中心为我们上课。这次访问经历使我获益良多，对于现代企业有了全面的感性认识，在许多具体的管理措施方面也打开了眼界。比如松下集团巨大而精确的营销网络、产品的人性化设计以及他们独特的"不评奖"制度，还有他们利用先进的计算机管理来大幅度降低库存成本等等，这种种细节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从日本回来后，在教育部的支持下，我又马不停蹄去了美国，访问了包括芝加哥、斯坦福在内的十来所名校。美国确实拥有世界上最早、最好的管理教育，他们不少精英都学管理，对于推动美国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起了很大作用。美国的著名大学几乎都有相对应的著名的商学院，从中可以看出他们对这一学科的重视程度。如果说我在日本学到了微观而具体的一些管理措施，在美国则更多的看到了整个管理教育体系的构建。回国后我在报刊上发表文章，大力推介国外名校管理学科的发展状况，希望以此为国内提供借鉴。同时，我也萌生了建立管理学院的大胆设想，因为管理人才应当是综合性的，仅仅一个系恐怕难以满足培养人才的需要。

在当时的艰苦情况下，建院看似根本不可能，学校主要领导意见也不一致。但我始终坚持自己的想法，继续向各个院系要人，开展各种动员说服工作。1984年，谢希德校长上任后，情况终于有所改善。

1985年学院成立之际，谢希德校长问我需要什么权力，我只要了一样：国际交流权，这项权力一直保留到现在。

向谢希德校长要权

谢校长上任以后将复旦管理学科的发展提上了议事日程，很快建立起资料室，并利用世界银行贷款引进了计算机系统。当时中央又提出，要大力引进国外先进的管理理论与方法为我所用，这一方针的出台以及学校领导的支持使得我们对外交流得到了迅速的增长。

1985年学院成立之际，谢希德校长问我需要什么样的权力，我只要了一样：国际交流权，这项权力一直保留到现在。之前我们与国外大学签订学术交流协议需要层层上报，先报外办、再报校长，这一圈下来颇费周折，效率自然不高。我争取到这项权力以后，整个流程被大大简化了。有一次我去一所常春藤大学访问，与院长相谈甚欢，他答应每年资助我们一个博士后过去学习。这是一个非常难得的机会，于是当场我就拍板签署了协议。我们的很多协议都是这样签下来的，包括与MIT的合作等等。在这方面我们甚至都超过了加拿大的大学，他们的院长也不具有签字拍板的权力。

全校第二台传真机

对于管院的发展，我们一直把追求世界一流标准的"标杆管理"作为自己的目标，因此国际交流权的获得的确是相当重要的，它为我们向国际派遣学习者提供了更多的机遇，也为国外学者到复旦的交流打造了更好的平台。到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管院接待外宾的数量一度占到复旦大学总量的1/3。建立复旦正大培训中心的目的之一，就是接待外宾的，这在当时很让

别的学校羡慕。

当然，那个时候各方面条件相对还是比较简陋的，我记得以前发传真也需要校长批，全校只有校长办公室有一台传真机。1988年一位日本教授赠给我们一台，我趁此机会找到校长，希望能让管院直接负责收发传真。因为我们对外交流的各项文件来往都极为依靠传真，如果每一份材料都需要校长批准才能传过去，那所有的工作都很难开展了。校长很爽快地就答应了，我们由此成为全校第二个拥有传真机的部门。

与国外的联系对于管院的发展是至关重要，在发轫之初尤其如此。我们克服了那么多困难、力排众议坚持自己的做法，说到底就是要发挥出一种“坚韧”的力量，这是一种韧性，是即使在高强度下也不会轻易言败的勇气。就像我们与MIT的合作，谈判前后进行了4次方达成协议；后来他们帮助复旦搞就业指导，一开始也有很多非议，但我觉得这项工作今后会越来越重要，坚持把这个项目建立了起来，事实证明了我们选择的正确性。正是凭着这份韧性，管院才一步步走到了今天。

上书教育部搞MBA

当时的中国，正处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期，机遇初现，但总体的环境并不太理想。1984年，学校上报教育部，要求成立经济学院和管理学院。但教育部有关人员却认为综合性大学只能成立经济学院，工科大学才能成立管理学院。其实美国的大学，多数都设有管理学院。这一点谢校长相当清楚，她就顶住教育部：要么不批，要么两个学院都批。这样顶了一年，终于使得复旦大学成为国内第一个同时拥有管理学院和经济学院的综合性大学，而别的综合大学那时候都只是把管理作为经济学院下面的一个系。

在多次去美国大学访问以后，我逐渐认识到：管理人才的培养大头应该在MBA。所以1985年，我联合了11个学校写了一个报告给教育部，建议中国搞MBA项目。虽然没有马上得到回复，但我们一直在为此做准备。80年代国家经委搞培训，复旦千辛万苦争取成为了一个培训点，任务就是培养厂长、经理等在职人才。我觉得这可以作为MBA的一个起点，为将来积累经验，就投入很大力量认真地开展工作，一直坚持到1991年。教育部最初在考虑发展MBA时确定了6所高校，其中并没有复旦。我们不服气，请来了教育部人员亲自来复旦大学考察，组织了一批从国外归来的教师开座谈会，讨论我们的条件等，最后终于争取到这个机会，在复旦正式设立了MBA项目。

MBA并不是小问题，关系到管理学院生存发展的前景，所以我们从一开始就在据理力争。为了获得更广泛的支持，我们还请了各家新闻媒体来报道。当时有一个《劳动报》的记者在文章中居然称复旦“NBA”要招收研究生，这一说法让我们哭笑不得，也充分说明了人们对管理学科的不解和误解。包括学生也是如此，我们的第一届MBA学生只有7个，还是好不容易动员过来的。这些事实也让我更清醒地认识到：计划经济条件下是绝对不可能搞什么MBA、搞管理学科的。只有随着市场经济体系的逐步确立，中国的管理科学才能真正成长起来。所以有一位美国洛杉矶时报的记者，要我举一个对中国教育发展起重大影响的人物，我就举了邓小平，因为没有他的提倡与努力，也就没有市场经济的实行，更谈不上对管理人才的需求了。

信心、坚韧和闯劲

回顾这一路走来的风风雨雨，困难总是随时随地存在。如果老是盯着那些困难，我们就一步都迈不动了。在这个过程中我认为有几点因素是最关键的：一是坚定的信心与追求，要相信你所为之努力的这个事业；二是要有坚韧的意志；三就是要有敢为人先的闯劲。无论是白手起家有多么艰难，这些都是创业之根本。

